

# 评介《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鸡形目)

傅桐生

郑光美

(吉林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在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极为兴奋的看到,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作新教授等及有关单位的鸟类学工作者编著的我国动物志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四卷(鸡形目)出版问世。它反映了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动物学研究工作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编写和出版《中国动物志》,是动物学工作者和广大生产实践人员的迫切愿望。由于万恶的“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摧残和破坏科学研究工作,

迫害知识分子,致使编志工作遇到重重困难。打倒“四人帮”,科研得解放。《中国动物志》首卷的问世,是我国动物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我们相信《中国动物志》的其余各卷,一定会以更快的步伐陆续出版,为使我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

动物志是一项全国性的基本科学资料,是反映一个国家动物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鸟纲第四卷(鸡形目)是我国鸡形目研究的现阶段的总结,详尽讨论了我国已知种类,计有2科26属56种,另有74个亚种。对这些种类的鉴别特征、形态、生态、分布、亚种分化以

及分类问题的讨论和经济意义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书中并附有插图 28 张、分布图 25 张、原色外形及鸟卵图 8 版以及古画照片 2 帧。

本书包括总论及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扼要地阐述了鸡形目的形态解剖学特征、生物学特征、国内外有关鸡形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鸡形目在国内外的地理分布特征、野生鸡类的饲养管理以及经济意义等内容。这些既是对有关鸡形目基础知识的介绍,也是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总评述,反映出作者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编志工作,努力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使动物志能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各论部分是本卷的主要内容一包括有名称、地理分布、鉴别特征、形态、分类讨论、生态、经济意义等各项。

在对各属、种、亚种的讨论之后,附有文献。书末附有种名的拉英汉、英拉汉名称对照以及与鸡形目研究有关的参考文献。

综观全书,不论从标本资料的充实性,对分类理论(特别是对我国特产种类)的探讨,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关鸡形目分类贡献的考证和解放后科研成果的汇集,以及编志工作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专业队伍如何与生产实践人员相结合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体现了在编志工作中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国自己编志道路的精神,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 标本资料较充实** 本卷所据以研究和描述的标本,占国内已知种数的 86%、亚种数的 78%。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采集到的,包括对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等地区系统科学考察所获得的珍贵资料,因而能够把很多分类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加以订正和澄清,并进而对亚种分化、梯度变异等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二) 突出反映我国自古以来、特别是解放后有关鸡形目的研究成果** 我国早在殷商时代及周朝就已经有了关于猎禽和驯化饲养鸡类的纪录,随后历代的方志、专著及博物志等古籍中都有丰富的资料,至明朝《本草纲目》则有更为广泛的记述。把古代记述用现代的科学分类的知识加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做到“古为今用”,这不仅对于动物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史工作,都有着重要意义。本书作者在对古籍古画有关鸡类的考证方面亦作了一定研究。例如我国家鸡的起源问题,在一般的《家禽学》书籍中,都说我国家鸡是由印度传来的。这种说法是由达尔文依据我国的“百科全书”(系指明朝《三才图会》)首先提出来的,后人都受了他的影响。作者通过我国考古研究及古籍的考证,推翻了达尔文的“权威”说法,证明了我国劳动人民,对家鸡的驯化,还早于印度。

一部动物志绝不是资料汇编或百科全书,而应该

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进行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联系生产实际并能指导生产实践活动。作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认真研究和取舍,在介绍国外有关鸡形目研究成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反映我国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解放以来群众性科研成果上,而不是“言必称希腊”,从而体现了《中国动物志》的特色。对于过去以外国人命名的和带有殖民地文化色彩的野生鸡类的英文名称,一概加以纠正。所有这些,使我们读后更加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既看到我们祖先对科学的贡献,更看到解放以来科学工作的巨大成就。

**(三) 重视对我国特产种的研究** 我国鸡形目鸟类占世界总种数的五分之一,在国内所产的 56 种鸡类中,有三分之一是我国的特产种。其中雉鸡和乌鸡更是我国的特产属。对我国特产种类的形态、分类、亚种分化、梯度变异、亲缘关系与进化、分布与生活习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论述,是我国鸟类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整个鸟类分类学的贡献。本卷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并有较高的水平。在对种下分类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对血雉、乌鸡、金鸡、白鹇和勺鸡等 8 个属和种的系统演化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值得其它各卷编写时作为参考。

对于我国特产种类,我国科学家是最有发言权的,也是完全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例如我国鸟类学工作者 1964 年所提出的白鹇的峨眉亚种,实则在 1930—31 年美国史密斯(Smith)在我国四川早已采到,但没有发现它是个与众不同而很有学术意义的白鹇,直到六十年代我国学者自行采到并钻研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新亚种。在这一新亚种提出的同时,作者还进行关于白鹇发源地或发生中心的推断,这也是近代系统分类学理论性研究的重要课题。又如作者在对褐马鸡的论述中,指出斯温霍(Swinhoe, 1862)把在天津市场上买到的,并不产于我国东北各省的褐马鸡订名为“*manchuricum*”,是一种草率的错误;指出藏马鸡仅产于我国境内。这些都不仅具有科学上的价值,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

**(四)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总论内有关专题的论述以及各论中对名称的考订、鉴别特征的提出等,都贯穿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与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特别是在亚种的中名方面所采用的以我国地名为主的命名,既便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和使用,也简明地表达了亚种做为种的地理宗的概念,有利于动物学知识的普及。以地名为主的亚种命名,也消除了很多以外国人名命名的以及带有殖民地文化色彩的名称的流传。

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需指出本书插图的绘制,在造型、生态环境的衬托方面,均有不少新颖之处。